

晚清货币
比价研究



王宏斌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2-16

晚清货币比价研究

王宏斌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晚清货币比价研究

王宏斌 著

责任编辑 段文勇

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开封市明伦街85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8.5字数：185千字

1990年2月第1版 1990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册 定价：3.20元

ISBN7-81018-407-5/K·54

序

在中国近代史的科研和教学中，开宗明义第一章，总要讲鸦片走私造成白银外流，白银外流造成银贵钱贱，从而激化了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粗略翻一下鸦片战争前夕的史料，银贵钱贱问题确是当时朝野上下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许多官员和理财家对银贵钱贱的原因提出种种不同的推测，而其中最有力的说法就是鸦片走私和白银外流。这种说法诚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如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进行更深入更全面的考察，就会发现它过于简单和肤浅，没有触及更深刻更复杂的社会经济背景。这个问题确实值得认真研究。

王宏斌同志《晚清货币比价研究》一书，对晚清银钱比价涨落的现象及其原因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讨，在大量资料和数据的基础上，提出许多新的思考，其中最富于创见的，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晚清货币比价变化的分期：过去的一些货币史论著通常划分为两个时期，即以1857年为界，前者是银价上涨时期，后者是银价回落时期。这种分期过于粗疏，不能准确反映银钱比价变化的实际。本书作者则划分为五个时期：

1、从乾隆三十一年开始到咸丰四年(1766—1854)，银价由每两八百文左右上涨至二千七八百文，最高时达三千文。

这一时期的银价上涨，又可以中外贸易中的白银流向大致划为两个阶段，即乾嘉阶段和道咸阶段，前者是白银内流的，后者是白银外流的。

2、从咸丰五年到同治四年(1855—1865)，这正是太平天国革命时期。银价由二千七八百文，在短短三年时间内便跌至一千一二百文，或一千三四百文，并在一千四五百文之间徘徊。

3、从同治五年到同治十三年(1866—1874)，这是一个银价短暂上涨时期，由一千三四百文很快涨至一千八百文以上。

4、从光绪元年到光绪三十年(1875—1904)，银价由每两一千八百文徐徐跌至一千一二百文，或更低一些。

5、从光绪三十一年至宣统三年(1905—1911)，银价由一千一二百文开始上涨，几年之后，有的省区超过二千文，有的达到一千八九百文，有的涨至一千六七百文，有的受灾省区却在一千文上下。

上述划分比较准确地反映了银钱比价变化的趋势。

二、作者依据马克思货币价值学说的原理，结合近代中国大量文献资料的比较研究，否定了传统的以货币数量变化解释货币比价变化的观点。例如，乾嘉时期的银价上涨是在白银内流情况下出现的。既然国内白银绝对数量增加银价反而大幅度上涨，那么传统的白银外溢引起银价上涨的观点就应当受到怀疑。又如，太平天国时期的银价突然暴跌，恰恰又发生在鸦片战后白银继续外溢时期。同样是在白银外溢情况下，银价既可以上涨，又可以下落，这就证明白银绝对数量的变化不是银价变化的主要原因。以此类推，其他时期的

银钱比价变化，都不能简单归之于数量的大小与增减。

三、作者不囿成见，突破传统的“鸦片输入——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的单线因果思维，把视野扩大到中国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国内一定时期一定地区的特殊政治经济环境，以及国际市场上贵金属价格的变化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综合考察，从而提出一些新的思考。例如对乾嘉——道咸时期银价的持续上涨，作者既注意到这一时期国际市场铜价的下落，影响了国内银钱比价的变化；又注意到中国社会经济的内在因素。作者认为：这一时期银贵钱贱的最大动因在于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社会对白银的需求不断增加，白银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地位日益重要，制钱的作用日益降低，变为“辅币”，中国的货币制度将由银钱并用时期过渡到银本位时期，货币流通领域发生银两排斥制钱运动，由白银的供求矛盾决定“银贵钱贱”，这是当时银价增昂的决定因素。而恰在这一时期鸦片走私日益扩大，白银输入日益缩减，最后逆转为白银外流，更加剧了白银的供求矛盾，促使银价猛烈上涨，超出了社会的承受力，“银贵钱贱”遂成为一种病态运动。

又如太平天国革命时期银价急剧下落，钱价相应上升，江浙地区尤为明显。作者认为这主要是受战争的影响。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货币流通的规律是不同的。在和平年代，人们总是努力积累贵金属，还要以首饰的形式贮藏贵金属；而战争(或大的灾荒)会迫使人们将平时贮藏的贵金属和金银器皿拿出来换取急需生活用品或招募兵员。这样一来加入货币流通之渠的贵金属突然增多，供大于求，价格便会急剧下跌。此外，还有更为深刻的原因，就是商品经济遭受战争

的破坏而严重萧条，大的商业活动陷于停滞，社会对贵金属的需求相应减弱，而制钱由于价值小，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方便，在小的商业活动中开始扮演媒介的主角。社会对银与钱的需求发生变化，导致银钱比价发生相应变化。

这些透辟的分析，使人们对晚清银钱比价变化的认识耳目一新，并随之由表入里，层层深入。同时，这对传统的货币数量的错误观点，也是一种有力的批判。因此，我认为这是一部有价值的科学著作，值得向学术界推荐，并向作者辛勤的劳绩，致以祝贺。当然，本书在分析银钱比价变化原因时，没有运用一般物价资料来参照对比，这是本书不足之处。这主要是因为目前缺乏系统的统计资料，有待于进一步地努力了。

胡思庸

1989年5月3日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乾嘉时期银价的逐渐上涨 (1766—1820)

一、乾嘉时期银价昂的情况	(7)
二、小钱与银贵钱贱	(10)
三、铜价下跌与银贵钱贱	(12)
四、洋钱与银贵钱贱	(14)
五、鸦片与银贵钱贱	(19)
六、“重银轻钱”与银贵钱贱	(23)
小 结	(31)

第二章 道咸时期的银贵钱贱 (1821—1854)

一、道咸时期银钱比价波动形势	(34)
二、白银外流不是银贵钱贱的决定因素	(38)
三、制钱减重与铜价下跌对银贵钱贱的影响	(44)
四、“银贵钱贱”的动力与方向	(49)
小 结	(55)

第三章 咸丰时期的银价暴跌 (1854—1865)

一、咸丰时期银价变化的趋势	(57)
---------------	--------

二、关于“铜贵钱少”问题.....	(61)
三、关于白银入超问题.....	(66)
四、关于世界银价下落问题.....	(75)
五、战争与银钱比价的下落.....	(79)
小结.....	(85)

第四章 同治中后期银价的再度增昂(1866—1874)

一、同治中后期银价增昂情况.....	(95)
二、白银出入与银价增昂.....	(98)
三、世界金银比价与中国银钱比价.....	(100)
四、铜价下跌与银钱比价的变化.....	(102)
五、银钱比价增昂与商品经济的恢复发展.....	(103)
小结.....	(108)

第五章 光绪时期银价下落与币制改革(1875—1904)

一、光绪时期银价的下落.....	(110)
二、银价下跌的原因.....	(114)
三、光绪时期的币制改革.....	(119)
小结.....	(128)

第六章 清末银价增昂与制钱制度的终结(1905—1911)

一、清末银价上涨的幅度与范围.....	(129)
二、铜元的冤词.....	(135)
三、清末银价上涨的主要原因.....	(142)
四、制钱制度的终结.....	(148)
小结.....	(150)

第七章 银钱比价波动与官吏贪污的手段

一、银贵钱贱形势下官吏搜刮财富的手段………	(153)
二、银贱钱贵情况下地方官吏的聚敛手段………	(158)
三、银钱比价波动为贪污中饱提供了机会………	(160)
小 结………	(163)

第八章 晚清货币数量学说批判

一、鸦片战争前后“银贵钱贱”形势下的货币数量学说………	(165)
二、太平天国时期银价暴跌形势下的货币数量学说………	(171)
三、清末“银贵钱贱”形势下的货币数量观点………	(174)
四、晚清货币数量学说批判………	(177)
小 结………	(183)

第九章 货币名目主义与咸丰钞票发行始末

一、道光时期关于发行纸币的学术争论………	(186)
二、咸丰时期统治集团内部的争论与抉择………	(199)
三、咸丰钞票发行始末及其社会危害………	(207)
小 结………	(220)

第十章 货币名目主义与咸丰大钱的兴废

一、道光时期关于铸发大钱的初步酝酿………	(224)
二、名目主义的得势与咸丰大钱的兴铸………	(230)
三、反名目主义的批评与大钱的停废………	(233)

四、市场的混乱与兵民的贫困	(237)
小结	(242)
附表一：金累年进出口额数表(1890—1912年)	(245)
附表二：银累年进出口额数表(1890—1911年)	(246)
附表三：乾隆道光间日本输入中国铜斤额 (1755—1851年)	(247)
附表四：铜累年进口额数表(1892—1911年)	(248)
附表五：清代金银比价变动表(1687—1911年)	(249)
附表六：伦敦银价与中国海关银两对英镑的汇率 (1833—1911年)	(252)
附表七：每担紫铜价值海关银两(1862—1911年)	(255)
附表八：海关两与各国货币比价表 (1868—1911年)	(256)
附表九：银元与铜元比价变动表(1902—1911年)	(258)
附表十：中国出入口货价总值统计表 (1864—1911年)	(259)
后记	(261)

绪 论

晚清(本书指1766—1911年)在市场上流通的货币多种多样，既有已经流通了二千多年的圆形方孔铜钱，又有尚未脱离条块形态的初始称量货币；既广泛流通西方国家输入的各种银币，又有中国自制的龙元、铜元；既盛行表示金属实际价值的货币，又有试图突破金属躯壳的不成熟的虚拟价值符号。有的已经衰落正在被挤出流通领域，有的则刚刚加入流通，有的旋试即败，有的盛行一时，新旧杂陈，纷繁多样，货币制度演变曲折复杂。而推动货币制度演变的主要动力之一是货币比价的激烈波动。本书的写作目的是，尽可能准确地探寻到导致晚清货币比价波动的真实原因，力求揭示货币运动的一般和特殊规律；以货币比价的变动为晴雨表，测试晚清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及其它问题；通过对当时各种各样货币理论和政策的简要分析，总结晚清货币改革的成败与得失，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与教训。

清人沿袭明朝的货币制度，银两与制钱并行。“银两”作为一种货币，它不象英镑那样与其实际重量相脱离，变成为一种铸币名称，直到清末它仍然是一种银锭的衡量单位，停留在称量货币阶段上。也就是说，它尚未脱离金属货币的初始阶段，是一种相当落后的货币制度。“制钱”是一种圆形方

孔铜钱，到清代它已有了二千多年漫长的历史。好象有一种超人的力量作了预先的安排，圆形方孔铜钱作为市场主要交换媒介，从战国开始流通到清末正式停止铸造，恰好与中国封建政治经济的兴衰相始终。清代制钱由于价值小，体积大，不便携带，不便计算，十分不利于大的商业活动。但是，由于银两制度存在着严重缺陷，制钱在日常的交换中仍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人们须臾不能离开它。所以，直到清末，银两与制钱在商品市场上依旧担负着主要流通手段的职能。研究晚清货币比价问题，重点自然应当集中在银钱比价的波动上。

严格地讲，银两与制钱之间，在清代并没有主币、辅币的区别。它们在市场上相互兑换时，两者之间的比价完全取决于货币材料价值的变化和供求的矛盾。清初曾经规定每一千枚制钱价值一两白银，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规定形同虚设。从满清贵族入关占领北京夺取统治宝座到1765年（乾隆三十年），这一百多年间银钱比价相对稳定，每两纹银在市场上只能兑换制钱八百枚左右；此后银钱比价变动十分激烈，在市场上很少出现一千文制钱恰好兑换一两白银的时期。以往，人们在谈论银钱比价波动对清代社会的影响时，通常都是从道光朝开始，实际上这是一种习惯错误。纵观清代银钱比价波动情况，可以发现银价上涨是从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开始的。因此，研究货币比价问题不能不以此为起点。自1766年到1911年，按照银钱比价变化的趋势，可以分为五个时期（1766—1854年，1855—1865年，1866—1874年，1875—1904年，1905—1911年）。其中第一个时期，按照白银流向的不同，可分为两个阶段（乾嘉阶段和道咸阶

段），为便于分析，必须分章论述。此外，由于银钱比价激烈波动引起的币制改革和货币价值理论等问题也有必要专章叙述，故全书分为十章，有的按时间划分，有的按专门问题进行讨论。为读者方便起见，现将各章轮廓勾画如下。

第一章分析1766—1820年（从乾隆三十一年到嘉庆二十五年）银钱比价变化的情况及其原因。这一时期银价上涨发生在白银内流情况下，每两银价由八百文左右，逐渐上涨至一千三百——一千四百文。银价上涨的原因比较复杂，既有“钱贱”的因素，又有“银贵”的因素。就制钱来讲，铜价下跌与制钱减重所造成的“钱贱”不能低估。就银贵方面来讲，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经济内部，即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长，社会对白银的需求不断增大，日渐形成“重银轻钱”，银贵而钱贱。此外，鸦片走私使入口白银数量锐减，流通手段量不足也影响着银价的变化。

第二章着重讨论道咸时期（1821—1854年）银价飞速上涨的原因。这一时期银价由一千三百文左右，飞速上涨至二千七百文上下。导致银钱比价大幅度变化的原因也很复杂。总的来讲，洋铜价格的下跌与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贵重金属（白银）排挤不太贵重的金属（铜）仍然起着决定作用，而白银大量被偷运出境与制钱自身减重变劣也起着重要作用。

第三章论述1855—1865年（咸丰五年到同治四年）银价暴跌的原因。由于战争严重破坏了国内商品经济的生产与流通，使大的商业活动陷于停顿瘫痪；战争又使大量窖藏的白银突然加入流通，直接或间接地改变了社会对银钱的不同需求，从而导致银钱市场比价突然大幅度跌落，每两纹银由价钱二千七百文以上急剧下跌至一千二百文。社会经济生活引

起强烈震动。

第四章着重探析1866—1874年（从同治五年到同治十三年）银钱比价突然回升的情况和原因。这一时期每两白银的价格由“一千一二百文”迅速增昂至一千八百文以上。银价上升的原因是：国内战争基本平息，社会政治趋于安定，商品经济重新恢复和发展，社会对白银和制钱的需求，与战时相比，发生了相反的变化。在经济生活中人们对白银的需求欲不断增加，而对制钱的流通作用日渐鄙薄，从而导致二者之间的比价发生了新的变化，时间虽短，上涨速度却很快。

第五章主要针对1875—1904年（从光绪元年到光绪三十年）银价缓慢下跌的原因和币制改革问题进行考察。这一时期每两白银由一千八百文，日渐下落到“一千一二百文”。主要由于世界白银生产量急剧增加，世界上多数经济发达的国家相继停废银币，改行金本位，白银被大量抛向世界金融市场，出现严重的供大于求的局面，银价因而大幅度下跌，并影响到日益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中国货币的价格。银价下跌又影响到清政府的财政收支。清政府迫于财政压力，进行了币制改革。由于政治腐败，币制改革归于失败，经验教训值得借鉴。

第六章重点分析1905—1911年（从光绪三十一年到宣统三年）银钱比价变化的情况。指出每两银价由一千一百到一千四百文，急剧上涨至“一千八九百文”，或“二千数十文”，主要原因是：在世界金融市场上，白银对于黄金的比价暂时停止了下跌的趋势，处于相对徘徊时期，并且有所回升；由于中国对外贸易的巨大差额和赔款，使白银流通量严重不足，还由于国内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社会对白银的需求更加强烈。

这些原因共同导致银钱比价再度发生变化。同时指出，银价变化很不平衡，这主要是经济不平衡的状况决定的。

第七章侧重于分析晚清银钱比价激烈波动所产生的社会经济问题。描绘晚清银钱比价不停的波动，极大地搅扰着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不仅使国际国内贸易受到严重影响，而且导致财政制度的破坏。财政收支的混乱又直接影响到政治生活，各级官吏利用这种混乱大肆贪污。贪污索贿成风，一发不可收拾，赋额日益减少，王朝的财政危机不断加深，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政治动荡不安。

第八章首先概述晚清不同时期的货币学者有关金属货币价值的讨论，指出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以货币数量的多少解释货币价值的变化，其理论前提是“物多则贱，寡则贵”。接着从理论上分析了这种货币数量学说的错误根源。

第九章叙述了咸丰年间为解决财政危机，发行钞票的过程，指出了货币名目主义的危害性，说明钞票流通有自己的特殊规律，违背其规律，实行通货膨胀政策是一种饮鸩止渴式的短视行为。

第十章总结了咸丰年间发行远远超出其币材实际价值的大钱的严重教训。指出咸丰大钱的强制推行与货币名目主义者的鼓噪有着直接关系。滥发大钱引起了货币流通领域的严重混乱，使发行大钱的地区长期处于萧条状态，商品经济遭受严重破坏，社会各阶层都蒙受了相当大的损失。大钱的推行没有帮助清政府克服财政危机。

比较研究有助于人们提出很有价值的，有时甚至是意义全新的问题。比较的考察还可以为公认的结论提供否定的确凿证据。在本书中笔者尽可能地进行比较考察，以便通过对

比，重新思考问题，得出新的结论。计量分，也是笔者试图解决问题的手段，但由于近代史籍的统计料过于零碎模糊，很难弄到系统的精确的数据，这不能不响结论的精确性，对此我深感不安，这些问题也希望读者引注意。对晚清货币比价的深入探讨，有待于金融史统计资的丰富和改善。